

周书文 伍中 万陆

祝禧文海选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6.2

159
魏禧文论选注

周书文 伍中 万陆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 5.25 字数 140 千

1984 年 5 月第 1 版 198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00

统一书号 10110·290 定价 0.46 元

目 录

魏禧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叙 跋

魏叔子文集自叙·····	(31)
宗子发文集序·····	(31)
赖古堂集序(节选)·····	(35)
恽逊庵先生文集序(节选)·····	(38)
曾庭闻文集序·····	(39)
甘健斋轴园稿叙·····	(42)
张无择文集叙·····	(45)
郑礼部集叙·····	(46)
俞右吉文集叙(节选)·····	(49)
左传经世叙·····	(50)
王竹亭文集序·····	(53)
周易辨序(节选)·····	(54)
八大家文抄选序·····	(55)
李季子文集叙(节选)·····	(58)
杂问引·····	(58)
文潏叙·····	(59)
陆悬圃文叙(节选)·····	(60)
学文堂文集序·····	(62)

研邻偶存叙·····	(64)
论世堂文集叙·····	(65)
朱锡鬯文集叙·····	(67)
彭躬庵文集序·····	(69)
徐禎起诗序·····	(72)
徐孝先诗序·····	(73)
溉堂续集叙(节选)·····	(75)
听鹈轩诗叙·····	(76)
唐邢若诗序·····	(78)
初蓉阁诗叙·····	(79)
耒湖诗集序·····	(81)
许士重诗叙·····	(83)
汪秋浦诗引·····	(84)
文引·····	(85)
叙引·····	(86)

书 简

答施愚山侍读书(节选)·····	(88)
附:施愚山《寄魏凝叔书》·····	(90)
与诸子世杰论文书·····	(92)
答蔡生书·····	(95)
上某抚军书(代)·····	(97)
复邱而康书·····	(101)
与毛驰黄论于太傅书·····	(103)
答曾君有书·····	(107)
答计甫草书·····	(110)

与谢约斋手简·····	(112)
答友人手简·····	(114)
复沈甸华手简·····	(114)
答孔正叔手简(一)·····	(115)
与彭中叔手简·····	(117)
答毛驰黄手简(节选)·····	(119)
与徐伯调手简·····	(120)
寄诸子世效、世俨手简(节选)·····	(120)
与友人手简·····	(121)
答石潮道人手简·····	(122)
答孔正叔手简(二)·····	(122)
与彭躬庵手简(节选)·····	(123)
复罗珂雪手简(节选)·····	(124)
与门人王愈融手简(节选)·····	(125)
与王若先手简(节选)·····	(126)

目 录

里言(一)·····	(127)
里言(二)·····	(127)
里言(三)(节选)·····	(128)
里言(四)·····	(129)
里言(五)·····	(130)
里言(六)·····	(130)
里言(七)·····	(130)
里言(八)·····	(131)
里言(九)·····	(131)

里言（十）（节选）·····	（132）
里言（十一）·····	（132）
里言（十二）·····	（133）
里言（十三）·····	（133）
里言（十四）·····	（134）
杂说（一）（节选）·····	（134）
杂说（二）·····	（135）
杂说（三）（节选）·····	（135）
杂说（四）·····	（136）
杂说（五）·····	（137）
杂说（六）·····	（138）
杂说（七）（节选）·····	（138）
杂说（八）·····	（138）
杂说（九）·····	（140）
杂说（十）·····	（141）
杂说（十一）·····	（141）
杂说（十二）·····	（141）
杂说（十三）·····	（142）
杂说（十四）·····	（142）
杂说（十五）·····	（143）
杂说（十六）（节选）·····	（143）
史论（一）·····	（145）

策 论

制科策（上）·····	（147）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杂 记

十二砚斋记（节选）·····	(150)
魏禧年表·····	(151)
选注后记·····	(159)

魏禧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

魏禧是清初著名的散文家、文学评论家。江西省宁都县人，生于公元1624年，卒于公元1680年。字冰叔，因排行第二，又字叔子，号裕斋，因住室名勺庭，又号勺庭，人称勺庭先生。他成长于朱明王朝内忧外患日趋尖锐、时代风云发生急剧变幻的年代。那时，不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席卷大江南北，严重动摇着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，资本主义因素也已萌芽、发展，更预兆着封建主义魔窟的岌岌将倾。1644年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已攻下北京，导致了明代的终结；原就雄踞关外觊觎中原的清兵，便乘机而入，并取而代之建立了清王朝。清王朝一经建立，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，除了在军事上、政治上实行专制外，在思想上、文化上也加强了控制，他们公开发布诏书，提倡程朱理学，反对所谓“异端跛说”，提倡模拟复古的制举文学，反对顾炎武等倡导的“经世致用”的古文。从此，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最后一个、也是更为黑暗的封建统治时期。于是，明朝的遗民，特别是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，如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，便从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清王朝进行斗争。提倡文学创作要身历目见，经世致用，反对模拟空谈，食古不化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从魏禧的家庭到整个社会，都充满了强烈的复明反清气

氛。他父亲兆凤，是明末诸生，明亡后就剪发为头陀，隐居在宁都的翠微峰上。魏禧从小随父读书，就学乡里。他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及家庭教养的熏染下，养成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，一直隐居乡里不肯仕清。尽管清政府为了收买人心，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，设立了博学鸿儒科，广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，并在地方政府举荐下，要他上京应诏，他却装病力辞，与兄祥、弟礼，姐夫邱维屏，好友彭士望、林时益、李腾蛟、曾灿、彭任等九人一起，在翠微峰开设易堂讲学，同时致力于诗歌、散文及文学评论的写作，一时誉满江南，仅闽赣两省就有数十县的学生慕名前来求教，人称“易堂九子”。三十九岁后，他深深感受到足不出户，难以开拓视野，增长见闻，反映世道民情，便毅然改装，到吴越等地交游考察，他的一些重要散文及文论，就是通过这种体验写成的。他们兄弟三人都以文章名世，人称“宁都三魏”。而他的学识文章更是出类拔萃，故人们又往往以魏禧作“三魏”的代表。他现在留存下来的作品有：《魏叔子文集》二十二卷，《目录》三卷，《诗》八卷，《左传经世》十卷。

与他在政治上不与清朝合作的民族气节相适应，他在讲学、著作中，同样表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，洋溢着高洁的民族主义气质；并且针对当时的模拟古人为能事、空谈身心性命的八股文风，响亮地提出了文学“有用于世”的主张，“积理与练识”的创见，法古而又“自立机轴”的要求，并以自己的简洁明快、长于议论的散文实践，抒发了“经世致用”的志向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，名闻大江南北，他与同时代的散文家侯方域、汪琬齐名，号称清初散文“三大家”。他的散文及文论，主要是散文评论，对尔后散文、文论的发展，在廓除模拟空

谈、推动面向实际方面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方以智到翠微峰，与他多次会见后，曾感叹地宣称“易堂真气，天下无两矣”^①。比他稍后的名流尚镛称赞他“见道之宏，持节之固，育材之多，能使当时之贤人君子生死无异词”；“以经济有用之文学，显天下百余年”^②。这是不算过誉的。尚镛还说，杭堇圃也推叔子为“古文大家”，“近世名儒最深者”，陆稼书也颂扬“叔子确是一家言，直与欧、苏相上下”^③。从这些评价中，足可看出他的文论和散文，对清初文学发展的影响之深远了。

魏禧的文论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。他没有文学理论的专著，往往是借为别人的作品写序、题跋的形式，抒发自己对文学的见解；或是用目录、杂感的形式，记述自己对文学的一得之见、一考之识。所以说，他的文学理论，反映在他对具体作者及作品的评论中。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。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其间不免夹杂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，但主要倾向是好的，有不少深刻独到的见解，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。最突出的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强调为文之要，贵在“有用于世”，这可说是他的文论的灵魂和核心；二是强调为文之道，在“积理与练识”，这可说是他的文论的基础和重点；三是强调“法古”之意，在于“自立机轴”，这可说在继承古文传统方面，富有独创精神之所在；四是强调艺术手法上的“各异其宜”，这可说是他的艺术观中最具辩证法光芒的篇章。所有这些，都很值得我们深入地分析研究、探讨借鉴。

现分别介绍、评论如下：

(一)

魏禧的文论，贯穿着一个立论的灵魂和核心：“有益于世”。他说：“予生平论文，主有益于世”^④。如果“忧乐不出户庭之内，语不及民生，吾未知其性情心术为何如也”。而且认为“识不高于庸众，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”，则“虽有奇文”，“亦可无作”。这就是说：文学创作不仅要反映“关系天下国家之故”的“事理”，还要“语及民生”、“有益于世”。他还把这个主张贯穿到一切方面：“积理与练识”要围绕“有益于世”进行；对传统的“成法”，也要以是否“有益于世”而决定弃取，只要“有益于世”，甚至也可以突破“成法”，自铸新格。

根据这个主张，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创作“必先立本”的要求：“文章之道，必先立本，本丰则末茂”。所谓“立本”，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从创作总体来说的，必先树立明确的创作目的，那就是要“有益于世”，这样才能根深土沃，叶茂花艳，“卓然自立于天下”。二是从具体作品的创作而言的，那就是“立意为先，一篇必有一意”，这才能笔如游龙，主题鲜明。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不论在创作总体中，还是在具体作品里，都不能脱离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，从而把文学“有益于世”的主张贯彻始终。

魏禧还明确指出：“论人必先器识，文必先根柢，此古人所以可传者，举世好文之士不察也”。所谓立本，还包括对人品和文品的要求，即论人先抓器识，论文先抓根柢。而文品的“根柢”与人品的“器识”是怎样的抓呢？他认为：“今日留

意古学不数人，立本以学古未一二得，向门下开说详至，然此皆本中之末，非本中之本。文章之本，必先正性情，治行谊……”这就是说，文章的立意是“本中之末”，而作者精神品德的修养才是“本中之本”，是至关重要的。这可说是抓住了创作的要害与根本。

魏禧所谓先抓文章的“根柢”，当然没有离开儒家的礼教观念、道德规范，不时搬出儒家的礼教信条相号召；但究其强调的重点，立论的主旨，却在于“世道民生”方面。他明确宣布：所谓“有益于世”，就是要“达当世之务以适于用”，

“正人心之惑溺，而救国家之败”，“故作文立意，先求为世所不可少，则自然卓犖。”这些观点，显然与白居易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王安石的“务为有补于世”，顾炎武的“经世致用”等进步主张，是一脉相承的。这就是主张文学不能脱离社会矛盾、不能脱离世道民生，而要为国家安危、民生疾苦而呐喊，为有益于世而战斗。根据这个观点，他进一步呼吁“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，则虽有奇文与《左》、《史》、韩、欧阳并立无二，亦可无作”。不管是鉴古还是观今，都应该“穷古今治乱得失”，反对那种“宗理迂阔不切事”及“忧乐不出户庭之内”的倾向。他认为：只有抓住了这样的“根柢”，才能“卓然自立于天下”，与古名家并驾驰骋，才能使文章“浩瀚蓬勃，出而不穷，动而不止”。根据这样的主题，对森罗万象的生活现象进行提炼和熔裁，创作出能针砭时事、剔抉世情，又妙语连珠，情真意美的艺术珍品来。

魏禧不仅看到了文章“立意”的重要，更看到了作者精神世界如何，对作品“根柢”的决定性影响。文学作品是一种观

念形态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体现，虽然人品与文品之间有不一致的情况，正如他指出的那样：“大奸能为大忠之文，至拙能袭至巧之论”。但一般情况下，文品高下常常反映作者人品的优劣。作品的思想倾向总是受作者精神面貌、审美观点及艺术趣味的制约，即使有相互矛盾的情况，但归根结蒂，作家的世界观、思想感情、道德情操、审美趣味如何，在摄取与表现生活时，总会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投影的；只要仔细分辨，总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端倪。所以，他说：“盖君子立言与立身立事，皆必有其大意，大意既定，则无往而不得其意。”就是说必须在作者的立身上下功夫，才能“无往而不得其意”；否则，要抓好为文的根柢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他说：“士不立品者，文虽贵实践；士不适用者，文虽切实浮。君子虽爱之赏之，不过如鹦鹉之能言，孔翠之羽毛已耳！嗟呼，文人方自恃其文，为撑天地、光日月，流川峙岳之物，而君子乃等之于禽鸟耳目之玩，不亦大可哀耶！”他把那种言行不一、人文不一，奸以忠出、拙以巧现的现象，看作为鹦鹉的学舌、孔翠的羽毛那样，不过是“禽鸟耳目之玩”罢了！揭露得多么透辟尖锐，讥讽得多么痛快淋漓！

当然，从魏禧强调“立品”的要求来看，没有也不可能跳出封建礼教的窠臼，他就这样说过：“文章之本，必先正性情，治行谊，使吾之身不背于忠孝节义，则发之言者，必笃实而可传。”然而由于他根据时代的特点，在具体表述“忠孝节义”内容时，又侧重在民族情操方面，当国家、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，要有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气节与操守；遇到艰苦困难时，要有坚定不屈的毅力与锐气；在国计民生问题上，要有除恶务尽、树德务滋的品德修养。他明确指出：“夫君子

立言，必取其关于世道民生，虽伏处岩穴，犹将任天下之责。”要求作者虽然生活在穷乡僻壤、山岩洞室，也要自觉关心世道民生，国家安危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。他还提出：“必刚气以为本。无刚气而自托和平，即不如乡愿，必且萎靡游移，临大节不能守，当大难不能济，遇大疑不能决，至于见善人而用之不力，见恶人去之不尽。人于文章亦然。”有了这种品德，才能在为文时作到“气盛”，如高屋建瓴，既能俯仰古今，理直气壮，又能深入隐微，取譬精警，“议今，则当世不眩；规过，则后世可惩。”这是有鲜明的时代向往，独特的时代要求的，也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，与程朱理学那种“高谈性命”、“辨究身心”之说，显然大异其趣。

魏禧的既重人品修养，又重文品立意的主张，是互相统一、紧密结合的。他立足于作者思想情操的修养，把作者的“立身”当作“本中之本”来强调，又落脚于文章的立意能“正人心之惑溺，而救国家之败”。这就把“立身”与“立意”统一起来了，并共同建筑在“有益于世”的政治要求上。虽然他的政治理想与我们的政治理想不能相提并论，但这种把立身与立意相统一，要求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，以求“有益于世”的主张，对我们今天的创作，仍有学习、借鉴意义。

（二）

如果说魏禧文论的灵魂和核心是贵在“有益于世”，那么，他文论的基础和重点，也就是实现“有益于世”的途径，就是“积理与练识”。这是他独创的得意之论，也是他用来鞭

策自己、要求别人的重要尺度。他反复声称：“愚尝以为为文之道，欲卓然自立于天下，在于积理而练识。”又说：“吾又尝谓文章之根柢，在于学道而积理；守道不笃，见理不明，而好议论以刺讥于人，翻古人之成说，则虽极文章之工，取适于己而有所误于人，君子盖有所不取。”他不仅把这当作前人及自己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与总结，而且当作评论、指导文学创作的指南，作为实现“有益于世”的途径。从这一理论的基本倾向、基本要求来看，有这样两大特点：一是在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，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提出、但实际上却反映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观点，反映出他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倾向；二是在生活积累与艺术概括的关系上，看到了丰富的生活储存的重要性，艺术概括的必要性；没有从生活积累到艺术概括的飞跃，就不可能有认识上、艺术上的深化，这反映出他艺术观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所谓“积理”，尽管夹杂着宋明道学家关于“理”的玄妙论述，给他的艺术观罩上了一层封建的迷云嶂雾；但从他对“积理”的主要论述和要求来看，主要是：充分积累古今兴衰治乱的得失经验，丰富对自然、社会知识的储存。这可以从他提出“积理”的四个主要途径中得到充分说明。创作为什么要“积理”呢？他精辟地指出：“辟之富人积财，金玉、布帛、竹头、木屑、粪土之属，无不预贮，初不必有所用之。而当其必需，则粪土之用，有时与金玉同功。”这就是说：“积理”是创作的必要前提，是得以加工、升华为艺术品的基础。有了这种积累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，就能左右逢源，游刃有余，即使在积理时看来如“粪土之属”的东西，也可能发挥“与金玉同功”的作用，成为反映主题、经世致用的点睛之材。所以，

他认为创作就如“采鱼者，必张网于大泽；猎兽者，必设穴于深山”，要到生活中广取博收。否则，舍本求末，面壁虚构，就象“涉泽以求兽，而越山以问鱼，是所谓索燧人以三凌之冰，索骥骥之足而责千里者也。”那是注定要失败的。

如何“积理”呢？他提出了四个途径：一是强调“贵在于用”指导下的博览群书。在广泛涉猎中去“穷古今治乱得失”，“极古今人情事物之变”，借鉴历史兴亡之理、治乱之得失。目的在于“留意一切有用之学”，“拣择用之”，以便“坐可言，起可行而有效”。但他又反对那种“端居闭户，索古人书册而得之”，向书本讨生活的态度。这样，他就把读书“积理”看作为理解历史“治乱得失”、“人情事物之变”的重要途径；又把掌握这种历史生活的真理，放到有益于世的基点上，体现了学习、积累书本知识的现实主义态度。二是提倡深入各阶层群众“广涉博取”人情世态，积累生活见闻。他提出：“人生平耳目见闻，身所经历，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。虽市侩、优倡、大猾、逆贼之情状，灶婢、丐夫、米盐凌杂、鄙褻之故，必皆深思而谨识之，酝酿蓄积，沉浸而不轻发。”虽然受阶级偏见的限制，他对下层群众使用了一些污辱性语言来陈述，然而却承认他们在各种生活“情状”中，包括有“所以然之理”，应该“深思谨识之”，不能闭目塞听，置若罔闻。并且还指出：“廿年来好交天下士，然不能交行伍屠沽，此间失却无数真才。足下广涉博取，入粗入细，夹袋中物能一一举示我乎？”不仅认识到自己不接近下层群众的局限，以至“不晓星纬、九州、形势、声律、飞、走、植、潜之性，不能情状物审”，而且还发现下层群众之中确有“无数真才”，深为交臂失之而惋惜，并且要向友人索取、弥补了。他还极力赞扬清

代学者周亮工能不问老稚贵贱，大都僻邑，虚心求教、勤学好问的态度：“延见布衣之士，相与咨询议论，闻人有一艺之长，一言之善，则必记录而奖誉之。不问其老稚贵贱，大都僻邑，未谋面未通名氏之人”。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，能够提出这种向群众、向生活学习的态度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难能可贵的。三是提倡游历山川名胜，名都大邑，扩大生活见闻，开拓艺术视野。他提出：“古之能文者，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，以补风土之不足，而变化其质。司马迁，龙门人，纵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汇，故其文奇姿荡轶，得南戒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也。”他以司马迁为例，把游历山川名胜，对开拓艺术视野，改变文风、文气的作用，作为一条艺术创作经验提了出来，是很有见地的。四是提倡不断“躬行”，以“辨之不已”地捕捉变化不息的天下事理。他说：“日月有定位，而昼夜寒暑之推迁，其变无有穷极。惟变易，故天下之人可各以其意为说；惟不易，故众说杂陈，无不可以明。易而必有其独是。知其是，则明其非；知其独是，则其是而未全乎是者，皆可以明，此辨之不可已也。”清楚地指出：从宇宙星辰的定位，日夜寒暑的推迁，“天地之气运有时而移”，直到社会的盛衰更替，都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。而人们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也就没有止境，没有穷尽。这就要不断知其是，明其非，不断“辨之不已”地“练识”。尽管他在有些问题上流露过历史唯心主义观点，“古今文章，代有不同，而其大变有二：自唐虞至两汉，此与世运递降者也；自魏晋以迄于今，此不与世运递降者也。”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，不符合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规律。但从他总的指导思想看，却是积极的，向上的。他曾明确指出：“吾伯子之言曰：‘天下事理无有穷极，古人留不